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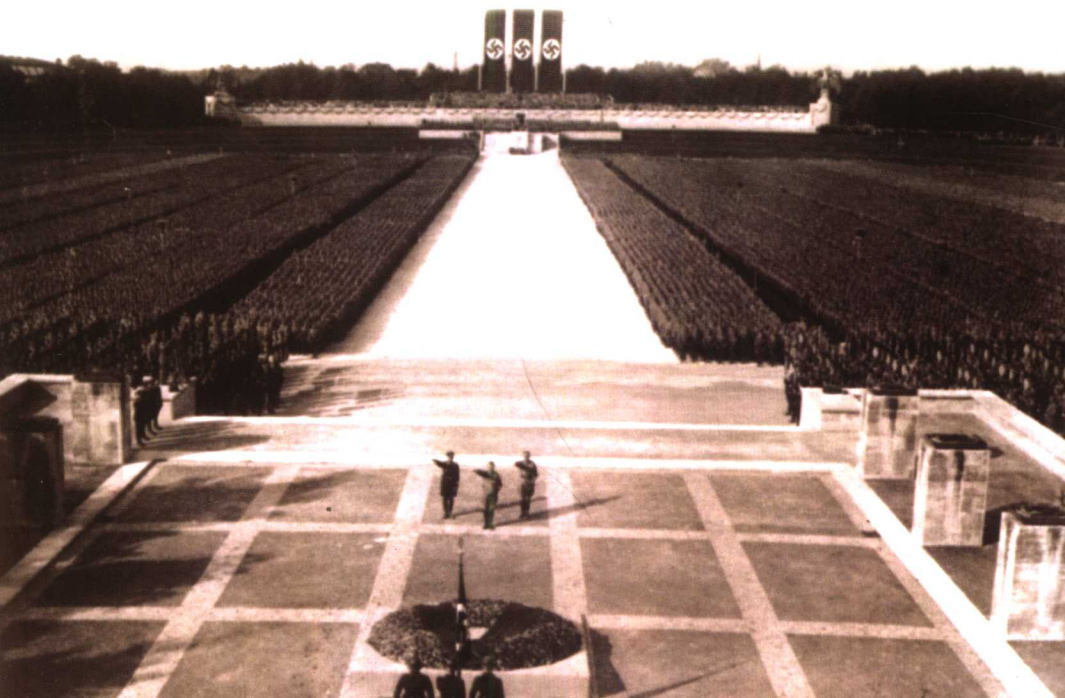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顾士渊 吴裕康 译

德语课

DEUTSCHSTUNDE

Siegfried Lenz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顾士渊 吴裕康 译

德语课

DEUTSCHSTUNDE

Siegfried Lenz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课/[德] 伦茨著;顾士渊 吴裕康译. —上海: 文
汇出版社, 2006. 9

ISBN 7-80741-023-X

I. 德... II. ① 伦... ② 顾... ③ 吴...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547 号

图字: 09-2006-341

Copyright © 1968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本书翻译赞助机构为哥德学院(GI)

德 语 课

著 者 /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译 者 / 顾士渊 吴裕康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40 千

印 张 / 13.375

印 数 / 1—5000

ISBN 7-80741-023-X/I·011

定价 / 26.00 元

序 言

钱定平

十五六年前，我在德国莱茵河畔科布伦茨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因为当时从中国来的教授很少，有一所中文作为选修课的中学闻讯前来，邀请我课余去他们那儿去“指导指导”。一天，中文课的内容是学生们用汉语讲讲自己的“爸爸”。十二三岁的男女学生一个个轮流上台，用稚嫩的中国话宣讲起来，有说爸爸是工人的，有吹是工厂主的，有侃是开小店的，更有讲是扫大街的……从他们的衣着装扮，看不出出身如此不同，真是一派“阶级调和”的天堂景象。有一位蛮漂亮的女同学，竟说她爸爸是“屠夫”，叫我忍俊不禁。原来，在德语方言里“屠户”同“屠杀者”读起来是一个音，而小女生又反过来查了一本不高明的“德中词典”，“屠户”就说成了“屠夫”。在我指出了她的错误后，那位秀丽的小女生依旧恪守课堂纪律、不动声色地往下说下去。这一幕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下课后，我问她阅读些什么书，她拿出来厚厚一本。我一看，原来就是伦茨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芳龄十二三的小娃娃，居然在阅读大人书了。她又把她的“读书笔记”拿给我看：“这是我的第一本伦茨小说。他用的是开满花朵一样的(blumig)句子套句子的文笔，我喜欢……”世上竟有“开满花朵一样的句子”么？后来，我买了《德语课》来读，不禁感到这位小女生上面讲的那句话，竟然就是伦茨特有文学风格的一个定评。当时，在《人工智能》的课堂上，我正教学生们如何编制电脑程序分析复杂的句子。伦茨的文本特色“句子套句子”的“嵌套结构句”(verschachtelte Sätze)，叫我的德国学生甘之如饴，这课程也大受伦茨之惠。

小女生那份鲜嫩的雍容和老成的天真叫我吃惊。实际上，凡是到过德国的中国人，一定都会对这个国家之社会生活井井有条、男女老少恪守纪律表示惊叹，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憨态可掬。从大的方面说，这就是日耳曼民族自认为“第二天性”(Sekundärtugenden)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这种天性曾经使得这个民族从寒冷蛮荒中走来，在欧洲腹部丰饶之地安身立命，又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处境一跃而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天性又极其坚韧，尽管遭受纳粹毁灭性的摧残，但是纪律和责任本身却没有打败仗。所以，二战后一二十年，德国又能在一片废墟中站起挺立。这种日耳曼式样的恪守规矩、一板一眼的民族性，曾经让我这个中国人击节赞叹，企羨不已。我曾经问过我的教授同事，德意志民族的这种优秀品质从何而来？回答是多元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提到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影响。而且，正像小说里讲的，“这种顺从是她(母亲)教会我的”，就这么代代相传，具有遗传因子一般的神奇功效。我们中国人当然是伟大民族，但也是一个既缺乏宗教感又没有经过文艺复兴的民族，怎不叫我望洋兴叹？我进一步想把两个民族的深层文化两相对比一下。中国圣人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人者仁也”，做到“仁”至少要两个人。所以，中国人是要靠别的什么东西定义他的，或家族，或亲朋，或单位，或团体，没有这些他就连个人也不是。德语有严格的语法规则，德国人是靠纪律和规矩来定义的，有了这点他们就民族兴旺。

伦茨(S. Lenz)同伯尔和格拉斯齐名，他们被公认为当代德语文学三大家。所不同的，只是后面两位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已。伦茨生在德国北方的普鲁士，是“典型的”德国人。但是，他却通过《德语课》这本小说，对于那千年形成的顺从、纪律和尽职等民族禀性说了一个字：

不！

《德语课》从结构上说是“框形小说”(Rahmenerzählung)，这

是德国人喜爱的艺术形式，伦茨在小说里多次提到过的同乡、十九世纪抒情诗人施托姆写了脍炙人口的《茵梦湖》(Immensee)，便是“框形小说”的一尊范例。小说的各种结构中我特别喜爱“框形”，正如词牌中我对“忆江南”情有独钟一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两种艺术结构都像爱翁的相对论一样，都能带给人一种时空辽阔、物是人非的沧桑而凄美之感。框形结构的叙事有个特点，一头一尾里头人物和地点有时连时间也一致，而在当中则推演故事，腾挪跌宕，好像是包在一个胡桃壳儿里一样。《德语课》的首尾框架选在1954年，人物是一个“不良青年”，地点是青少年教养学校，叙事用第一人称。在一个大果壳儿当中，《德语课》却又套着不同时空的小果壳儿。这可说是伦茨对传统框形小说的新发展。

且说，教养学校学生西吉在德文课给罚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尽职的快乐》。这个题目让他回忆起了一段痛苦往事，也是关于“我的爸爸”的，以至于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最后被关禁闭。“那就开头吧”！就这样，小说钻进了框子之中。原来，西吉的父亲在第三帝国时是家乡的一名警察，他的任务之一是监视一位原为纳粹党员却奋起反纳粹的画家南森，“必须制止画家的创作体验和创作念头，剥夺他的任何色彩言论，总之，他必须以警察的身份不准他……再作画”。尽管，画家曾经救过警察的命，但是，“责任就是责任”！西吉当时只有十岁，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且站在画家一边。他把画家的作品藏在一间破磨房里。战争终于结束，画家恢复了创作自由，禁令也理所当然取消了。可是，忠于职守的警察却还在继续执行着禁画的命令。有一次，居然还把画家的画册烧掉。这使得“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仇恨，想向他扑过去，用拳头狠狠揍他”。后来西吉藏画的磨房失火，他奋不顾身想冲进去，给阻止了，但藏着的绘画烧成了灰烬，西吉更怀疑是父亲干的。于是，他在画家的画展上偷窃艺术品，又藏起来。他的“偷盗”行为被发现了，给送到了教养学校……西吉在框子中回忆过去，他作文

愈写愈勤，一发不可收拾，竟嗜写成癖，甚至“只要送我回去继续写作文，我永远不会再有不良表现”。最后，他居然写了一大捆，使得教师深感满意，决定解除教养。但是，出了框子的西吉面对与回忆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却是一片茫然：“我该做什么呢？我该去哪儿，在哪儿为自己找个藏身之处呢？”

作家把日耳曼人的“第二天性”服从和尽职漫画化了，揭露了在第三帝国那种特定条件下，这种本来良好的品质会带来如何毁灭性的后果。这篇小说跟我最近翻译的《朗读者》一样，是个荒谬绝伦的故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存在难道不就是荒谬么？二战之后，很少有年轻人不受海德格尔、雅斯贝、萨特和加缪等人存在主义的影响：存在就是荒谬。更远一点，卡夫卡还在散发着悠悠的文学能量。以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学，其特点之一，就是描写人类在孤独隔离状态下的极端苦闷和反常心理，德国作家也概莫能外。

于是，我们的读者便看到了一种“井蛙视界”(Froschperspektive)。格拉斯《铁皮鼓》里的奥斯卡是典型的“井蛙”，《德语课》里的西吉本来就生性孤僻，也是被困在“井蛙视界”之中。小说里反问西吉的警察父亲道：“你认识到了尽职的快乐能驱使一个人怎样吗？能使人发展到什么地步吗？”他可说是“井蛙视界”之最！盲目的忠于职守使他参与迫害自己的救命恩人，顽固的笃信责任使他在英国人已经进村后，他还在电话里“大声叫嚷着”“守卫公路，是！”“保证执行！”认真自愿而不是被强迫地给自己、给家人、给家乡执行死刑。如果当时的德国人人都侵蚀了这一“毒瘾”，那么，我们从远处就能看见这个国家像一名无头巨人，在悬崖边上“奋勇前进”。这，难道还不需要彻底深思和反省么？

伦茨文学的特点是大胆干预现实生活，作家对于时代之声总是富有敏锐感受。所以，通过他特有的叙事方式，以一种很现实的、有时是很民间风的风格博得了大众的喜悦。但是，作家又是深刻而隽永的。从伦茨的小说里，读者就能够领略到个人微弱命运

与集权统治结构之间的深刻冲突。从这里更可以体味他作品的整体特点，那就是一种存在主义混合着宿命主义的根本态度，又映照在道德缺陷母题之下，将这种态度深深镌刻在他的种种艺术形象上面。为了使作品跃上这个高度，伦茨往往笔走极端，把他笔下的人物置于一种绝地的境遇之中，以便充分表现社会的众生相，一边是沉沦而不自拔，另一边是背叛而不自觉。所以，即便是在阿登纳治下的经济起飞年代，伦茨也着力表现物欲横流之中，人性本原和人际关系如何缺失和叛逆。小说《德语课》更形象地说明，如果那权力是反动的，那么，一味在一个铁笼子里恪尽职守，会让整个民族付出多大的代价；因为，权力必然要千千万万尽职的人给予支撑。小说里这么说那位正直的画家：“履行职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他将会为对付这种疾病尽力而为”。当然，小说的主旨又在于昭示一事实，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终于进行了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德语课》这本小说伦茨写了四年之久。出版时正好是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群情激动的时代。时代呼唤作家，也会对忠实描写她的作家加以青睐。第二年《德语课》在畅销书榜上登场，很快就销售了二十五万册，这还只是精装本的数字，截止本世纪初已印刷了十九版。初版后几年袖珍本问世，《德语课》更登堂入室，进入了中学课堂，真正成了“德语课”读物。我到德国大学教书、同那位秀美的小娃儿邂逅相遇，已经是这之后二十年，当中不知道又印刷了多少次。日月荏苒，今年是作家八十大寿，出版社又特别推出新版。由此可见，这堂“德语课”是怎么样历久不衰！

只有严肃的作家才写得出荒谬的作品，因为真正的荒谬诉诸理性，需要深度；而荒谬作品也是对严肃读者的巨大犒赏，并从读者那里获得丰厚的报偿。这里面有一个社会与作家互动的文化问题。在德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大众文化”(Massenkultur)迅猛兴起，这从两方面促进了上述互动：一是图书销售的正规化和技术化(Marketing)，二是电视的爆炸性普及。出版社开始把图书作

为工厂产品看待，对广告进行海量投入。伦茨非常幸运，他成了新时期出版的第一个受惠者，《德语课》的启动广告费就达十万马克之巨，突破了德国图书广告有史以来的记录。这还附带说明了一条真理，深刻的作品未必不敌肤浅，严肃的读者必定唾弃“骚包”。

可以说，那位小女生的读书笔记是一尊巨大的艺术隐喻。其实，战后德国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德语课”，就是在伦茨《德语课》的朗朗书声中走出来的。同时，因为德国中学上课是讲解少、讨论多，而《德语课》的讨论又往往集中在“什么是责任？”这个重大题目，这就强化了主题，深化了认识，把人类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挖掘出来。我想，这就是这本小说在当代德语文学中的意义了。

对于中国读者，即便不上“德语课”，也不妨边读读小说，边听听其他的“课”。伸而言之，我认为，目前正像小说里说到的，“在一个不再有可信的人性价值的时代”，中国作家特别有补课的需要。在关鸿兄主政《笔会》时，我曾经发表过一篇长文《文化柔肠科学魂》。里面提出一个观点，文艺需要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的“制导”，就像飞弹需要电脑程序制导一样。我今天还是坚持，一堆没有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作支柱、而又不关怀现实生活疾苦的文艺，一定是一抔忽视人类之具有普遍意义东西的文艺，也必定是一阵肤浅庸俗、过眼云烟的文艺——我们现在难道还见识得少么？

再往深里说，从小说《德文课》看中德两大民族的深层文化，意义极大。前边已经说到，中国人是要靠别的什么东西定义他的，没有这些他就连个人也不是。从这一点可以推出我们民族的所有弊病。德国人是靠纪律和规矩来定义的，有了这点他们就安身立命。从这一点也可以推出他们民族的所有症结。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纪律有规矩总比没有要好。

最重要的，是要讲讲两位译者和他们的译品。

士渊、裕康是我的北大校友，他们就读西语系，我厕身数学系。我们在北大并没有谋面，后来通过德国文化作媒介而订交。士渊在德国干外交多年，练就一口极标准的口语；他脱口秀的德语是我

听到过的最漂亮的德国话，包括德国人在内。从前常有人把北外和北大的学生比较，说前者口语棒，后者文学精。以士渊这样的双料才具从事翻译，应该是驾轻就熟；裕康做过几十年文艺出版社的德语编辑，自己也翻译过许多德国作家，如托马斯·曼的优秀小说，资质非同小可。他们手里都拿着中、德双语俱佳这把双刃宝剑，翻译本书可说游刃有余。拿我的德语水平来说，哪有资格对他们的作品随意雌黄？但他们俩的确译得优异，值得向读者推荐。因为，伦茨的华章通过译者的妙笔已经化成了中文的佳什，我下面就混在一起说说。

小说是个荒谬的故事，叙事的方式扑朔迷离，事件的时空错落流转，主角的行为特行独立。又因为框形结构允许在当中部分跳跃和间断，也就使故事的演进平添了朦胧晦涩。伦茨的德文辞藻丰繁，句子很长，对于德国人是享受，对于翻译却是苦差。作家似乎害怕读者读不懂，因此特意安排了一位心理学家，把西吉的行为模式写成研究报告，进行解明。这可以说是匠心独具，也可见作家也自知其难点。

首先，两位的译文选词精当，文笔流畅，中文达四百页，读者可以一口气读下去。这里想提醒一下，读者读着清丽畅达的文句，绝对想不到原文本来如何弯弯绕！例如一开始，教授写出罚写作文的题目：

他走到黑板前，抓起粉笔，抬起长得很丑的手，袖子滑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条干瘪、枯黄、至少是百岁老头的胳膊。他把作文题用自己那弯弯曲曲的斜体字写到黑板上，那是一种十分做作的斜体字。题目为“尽职的快乐”。

原文竟长达六十个词儿，句子又套句子。译文因为用词精妙，安排妥帖，成就了地道的中国话。又如，写到画家妻子去世，全村人都去送葬时的情景：

要是那个星期六有一架飞机飞临我们这个地区，那么，飞行员就会见到这样的景象：星星点点的人，或单独一个，或三五成群，被

风吹得稍稍向后仰，或是侧起身子迎着风，或是低低弯下腰顶着风，向着—块空地移动，石子路把田野分成两块长方形，周围有一道破洞很多的树篱。他们经过一片肮脏的、到处都在变黑的雪地，在小路上横跨水沟的木板桥上相遇，汇合在一起，互相匆匆地打招呼，接着又向前涌动，人数更多了，形成了一个新的编队，朝着那整齐的、肯定是人工堆起的土岗走去，土岗上只有一幢高大的长条形红砖楼房。

原文是一百多词语的复杂长句，译者驾轻就熟，处理得当，读者读起来顺畅流畅，绝对想不到原文会那么“深文周纳”。而且，德文是没有量词的，只有数词一、二、三等等。这里，译者用各不相同的量词翻译德文的同一个词汇，真乃街华佩实。再者，德文长句的特点是一个字：“碎”，将一句分成许多零零碎碎句段，肺活量小一口气读不下来。这不像中文句子是远近平畴，一望无余，要翻译就很不办。宋代词学家张炎评词人吴梦窗词说：“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伦茨的德文好像是拆碎的片段，两位译者竟将碎片再重装成七宝楼台！

伦茨笔下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非常注意意象（如虚构的“巴尔塔萨”），但也要译笔生花升华。由于译文真切地传达了原文，读着读着，我所认识的那些德国人就在眼前跟着晃动起来。刻板严格的父亲（“禁令是对所有人制定的，也包括他在内。这是我的职责。”为了履行职责，警察不惜同家人一刀两断），迟钝麻木的母亲（“她对什么食物都不会觉得太烫”），正直执拗的画家（在一个“鬼怪横行”的国家里，他不愿意做“德国阴毛”的画家，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描绘了这种政治上的妖魔鬼怪”），甚至偶尔一提的过客（他不是只戴一枚党徽，而是同时戴上三枚党徽：一枚在衬衣上，一枚在外衣上，一枚在大衣上），等等人物都写得极其出色。小说写饭桌旁的众人：“坐在……那条最温柔的海鱈鱼旁边的是我母亲，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脸色，古板的发髻，活像一条海鲈鱼。还有一位却是东奔西跑、唠唠叨叨、像一条灯笼鱼似的快乐地游荡，这个人

就是画家。”“……等她一坐下，立刻变成了一条扁扁的鳎鱼。”这样形象生动、趣味盎然的文句此起彼伏，叫人目不暇接。小说厚达四百页，但是读者不会感觉其长，这全是译者的功劳。特别，小说模仿一个小孩子的眼光看外界事物，尤其鲜蹦活跳。父亲给画家画成海鸥，而一旦穿上警察礼服，“就像一只在星期天获准穿上管理员制服的狒狒”；一位前来看望画家的将军则像一只“笑眯眯的海豹”；有个女人，“耳环上足可以让三只小毛猴毫不费力到荡来荡去”。这种丽词佳句，不一而足。读者诸君，你们读着觉得有趣不有趣呢？

译者对于德语和汉语双双出奇地纯熟和恰到好处的把握，随处可见：“我们看见他在吃的时候吸溜、吧嗒、咀嚼和吞咽”。这里，关于“吃相”的四个意义接近但意蕴不同的德语词儿译得摇曳生姿：“我们在他们身边拥挤着，推搡着，挪动着”，关于“挤轧”的三组意思相类但观感不同的词儿译得各尽其妙。这种珠联璧的例子译本中很多。最后，再举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例子。原文“quirlen eine Eiswassersuppe”，他们翻译成“搅起了一河冰水汤！”把“河”作为量词，真亏得他们妙想翩跹……

这样的译作，完全可以说是再创造，现在翻译书市面上已经凤毛麟角了。眼下中国翻译家最欠缺的就是这中、外双馨的两手，他们往往只是独臂将军，甚至只有半条胳膊。

总之，两位翻译家“创作”了一本趣味盎然而意义深远的书，功莫大焉！

如果这篇小序让读者诸君尝到了些许甜头，就请赶紧阅读小说正文吧——甘蔗越吃越甜！

2006年6月5日

于上海衡括斋

目 录

序言	钱定平
一 罚写作文	001
二 禁止作画	012
三 海鸥	028
四 生日	049
五 藏身之地	072
六 第二视觉	099
七 中断	123
八 肖像	144
九 回家	166
十 期限	187
十一 看不见的画	207
十二 聚光镜下	229
十三 生物课	253
十四 观看	281
十五 继续	304
十六 恐惧	326
十七 疾病	344

十八 参观.....	362
十九 海岛.....	383
二十 分别.....	398
译后记.....	409

罚 写 作 文

他们罚我写篇作文。约斯威希亲自把我带进我的囚室。这位我们大家喜爱的看守员敲了敲窗栅栏，捏了捏草垫子，接着又仔仔细细检查了铁柜子和镜子后边我老藏东西的那个角落。然后他闷闷不乐地查看了桌子和满是刻痕的小板凳，对水池挺感兴趣地瞧了瞧，甚至反勾起手指向窗台板使劲地发出了几声叩问，还查了查炉子有没有问题。然后他走到我跟前，从容不迫地对我从肩膀到膝盖搜查了一遍，以确保我的口袋里没带危险品。他一脸责怪地把本子放到桌子上，这是本作文本，灰色的标签上写着：德语作文本，西吉·耶普森。他生性善良，替我伤心、失望之余招呼也不打就朝门外走去。我们时常挨罚，对此，这位我们喜爱的看守员约斯威希比我们更伤感，难受的时间更长，蒙受的阴影更深。他没用自己的话，而是用锁门的动作向我表明他很难过。他无精打采地把钥匙往锁眼里送，不知该怎么办似地捅了又捅，迟疑半晌，才转了一圈又停住了手，重新开了锁。他自责地狠命转动了两圈钥匙，像是对自己的犹豫不决作了个了断。把我关起来罚我做作文的不是别人，偏偏就是卡尔·约斯威希，一位孱弱而腼腆的人。

虽然我就这样坐了差不多整整一天，可怎么也动不了笔。从窗口望出去，易北河流过我模糊的倒影；我闭上眼睛，河水依然不

停地流，河面上铺满浮冰，发出蓝莹莹的光。我不由去注视拖船，这些拖船的船头漆皮剥落，外加挡板，在河面上剪裁出各式各样的灰色冰块。我还得直面易北河，看它如何在涨水的时候把冰块轧轧作响地挤上岸，一直推到干枯的芦苇丛中才罢手。我很讨厌地看着一群乌鸦，它们好像在施塔特那边有约会似的，分别从韦德尔、芬肯韦德和哈内弗桑德飞过来，在我们岛上会齐后飞上天，在空中盘旋，直到一阵顺风吹来，把它们送到施塔特。长着节疤的柳树上涂着闪亮的薄冰，还蒙上了一层干白霜，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分心的还有白颜色的铁丝网、劳动车间、河滩边的警示牌、菜地里的大块冻土——春天我们在看守的监督下在这儿自己种菜——甚至还包括太阳，阳光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显得有点暗淡，投下一些长长的斜影。有一回我不顾一切差不多要动手写了，可是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到那座用铁索固定的伤痕累累的浮桥上。桥头系着来自汉堡的一条汽艇，船不长但很宽敞，黄铜装饰物闪闪发亮。这条船每星期要运送多达一千两百名心理学家来这儿，他们对难以教育的青少年都表现出病态般的兴趣。我不能不关注这些心理学家，他们走上弯弯曲曲的河滩小道后被带进蓝色的教养所办公楼。寒暄过后，免不了还要关照他们须谨慎小心，调研时别露声色。然后，他们心急火燎地冲出大楼，装出漫无目的的模样，成群结队地在小岛上乱跑，去靠近我的那些朋友：譬如培勒·卡斯特内、艾迪·希路斯以及坏脾气的库尔特辛·尼克尔。教养所经过推算，认定在这个小岛上改造好的青少年出去后不再犯罪的概率为百分之八十，这帮心理学家对我们如此感兴趣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要不是约斯威希把我关在这里罚我写作文，他们肯定也会追到我的身后，肯定会把我的履历放到他们的聚光镜下，想方设法去弄清我的真面目。不过现在我非得补上这两节德语课，非得交出这篇作文来，我们那位希姆佩尔所长和瘦长而可怕的考尔布荣博士都等着要呢。这种事在邻岛是不可能发生的。与我们岛相邻的哈内弗桑德岛也位于易北河下游，在特维伦

弗莱特和维施哈芬方向。那儿也同样关着一批难以教育待改造的青少年。虽然两个岛的情况极其一致，虽然都是被油污的脏水包围，被同样的船只驶过，由同样的海鸥栖息，但在哈内弗桑德岛却没有科尔布荣博士，没有德语课，没有作文题，说句老实话，没有这种叫好多人还要受肉体折磨的作文题。所以我们许多人都宁愿去哈内弗桑德岛接受教养。那儿海船总要先从岛边经过；那儿炼油厂上空的熊熊烈火总是在向每一位过客问好。

要是在邻岛，我肯定不会被罚写作文的，因为在我们这儿发生的事到那儿是不会有。而在这儿，只要有一位高高瘦瘦、散发出膏药味的家伙迈着考尔布荣式的步伐走进教室，向我们轻蔑而威吓地扫一眼，等我们说了声“博士先生早！”后，便二话不说地把作文本朝下一发就行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他那模样，就像在享受什么乐趣似的。他走到黑板前，抓起粉笔，抬起长得很丑的手，袖子滑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条干瘪、枯黄、至少已是百岁老头的胳膊。他把作文题用自己那弯弯曲曲的斜体字写到黑板上，那是一种十分做作的斜体字。题目为“尽职的快乐”。我惊慌失措地去看班里的同学，只见大家弓着背，一脸困惑。同学们交头接耳，唉声叹气，双脚在地面上来回地蹭。我的同桌奥勒·普吕茨掀动起他肥厚的双唇，压低声音跟着一起念，他的抽风病马上要发作了。夏利耶·弗里德伦德最有作秀的天分，能让自己那张脸要白就白要绿就绿，随时随地可以装出很不舒服的样子来，于是所有的老师便会自动免去他的每门作业。此刻，夏利耶已经玩起他的呼吸把戏来了，虽然脸色还没有变，但脖子上青筋已经勃起，额头和上嘴唇已冒出汗珠。我掏出自己那面小镜子，斜对窗子，把阳光逮住后朝黑板方向反射。考尔布荣吓得马上回转身，跨两步走到讲台边，稳住一下情绪后便居高临下地命令我们动笔。他再一次举起那干瘪的胳膊，食指僵硬地指着作文题《尽职的快乐》。为避开提问，他补充道：大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是讲履行职责的快乐就行。

我认为罚我写作文同时将我关禁闭和暂时禁止会客这种做法